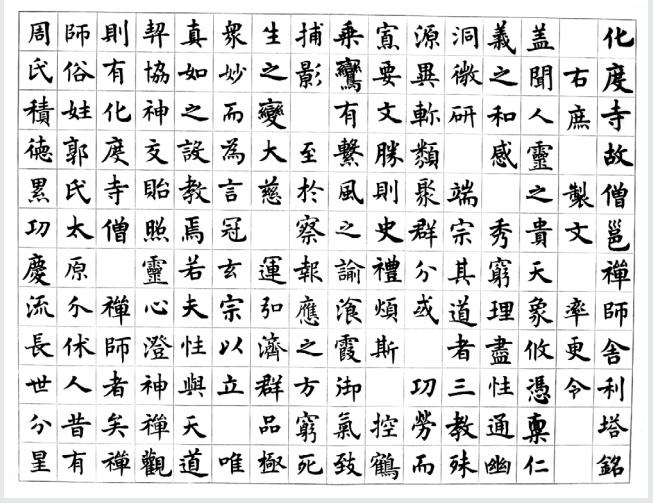
·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



李侠临《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

临书手记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

临摹作为自己学习书法道路上伴随一生的功课，是自身对书法的理解和审美取向的风向标，也是自己与古人不断交流呼吸的重要载体。

此次所临的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在我的学习书法历程中一直扮演者重要角色，初见《化度寺塔铭》并未在意，而只是作为一种学习书法的功课去完成对其的临摹。而后因年岁的增长，渐渐学会了对比和取舍，发现《化度寺塔铭》静穆浑厚，严密秀腴，能兼欧书另三碑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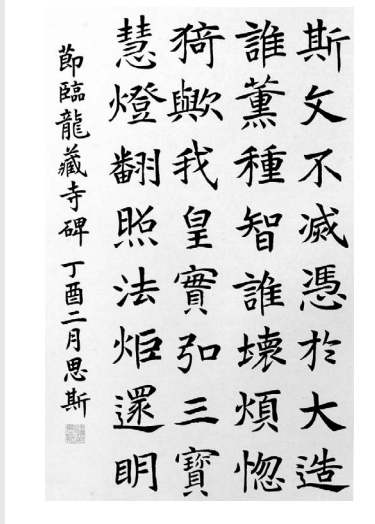
而每次读帖犹如王壮弘先生在《艺林杂谈》中提到的：

《化度寺塔铭》虽字有多处模糊处，而字画端倪皆隐约可寻，细而遒劲，精气内含，跃跃欲出，盖书法，摹勒俱佳，始克臻此。

此次临写，一反通常硬笔硬纸的书写，而借用生宣的自身表现力，反映自己在临写过程中的静穆之气。

练字犹如练心，能固本清源，方有思辨之力。

——李侠



潘思斯临《龙藏寺碑》

临书手记

两年前，看到王冬龄老师临的《龙藏寺碑》，他三十年来年年都要临写此碑，用以“做功夫”，我心想为何他偏偏选择了《龙藏寺碑》？

近来一个月，我将《龙藏寺碑》作为日课，在临习的过程中略略体会到其选择《龙藏寺碑》的原因。《龙藏寺碑》被誉为“隋碑之冠”，其书法宽博瘦劲，方整庄严，承魏启唐，具有古拙之趣。

我观《龙藏寺碑》常常被其中别有天趣的结构打动，如节临的这一段中的“薰”字，它将上半部的重心落入右边，“灬”紧收略偏左，出其不意，却又恰到好处，使得整个字的态势如优雅的舞女。孙过庭《书谱》中说：“察之尚精，拟之贵似”。临摹贵在似，不仅是形似更要神似。起初，我临摹时不得法，后来看了沈尹默先生临的《龙藏寺碑》，在他的笔墨语言中反观碑中的书写形态，才稍有体悟。然而我的临摹同原碑的精神面貌仍旧相去甚远，希望在反复的临写中体味其境，从中汲取更多。

——潘思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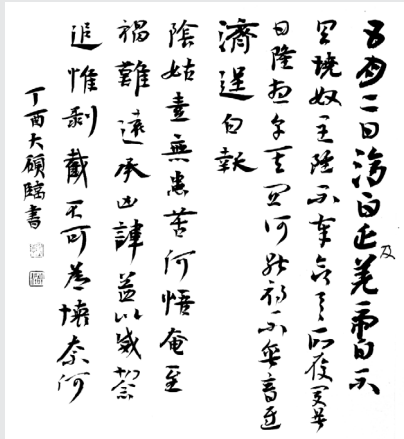
临书手记

魏晋之际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既可以上承汉末隶书发展到成熟之后而达到的顶峰状态，又能够下启从隶书中蜕变而产生的由楷、行、草书所构成的今体书法系统的重要时期。楼兰故城出土的汉文简牍残纸文书墨迹正能够很真实的反应这一时期内涵丰富而又复杂多样的书写状态。

《济白帖》正是当时章草风格的一个举证，行笔自然流畅，残纸虽只寥寥三行，但与张芝、索靖等诸家刻帖极为相近，与王羲之《寒切帖》墨迹相比，风神兼似，但《济白帖》又不是刻意加重“捺”笔“波磔”感，于是没有后来做作“波磔”使得字形失重的迹象。《济逞白报》墨迹的体势在扁方之间，标志着它是早期的楷体文字，但又刚从隶书中蜕变出来，有着明显的隶书笔意，其笔法与王羲之《姨母帖》有同工之妙。王字墨迹多后世勾摹所为，与楼兰残纸文书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他的书法是受到了篆隶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济白帖》《济逞白报》等楼兰墨迹是原汁原味的“魏晋风度”。

——许耕硕



许耕硕临《济白帖》

刘亚晴临《峄山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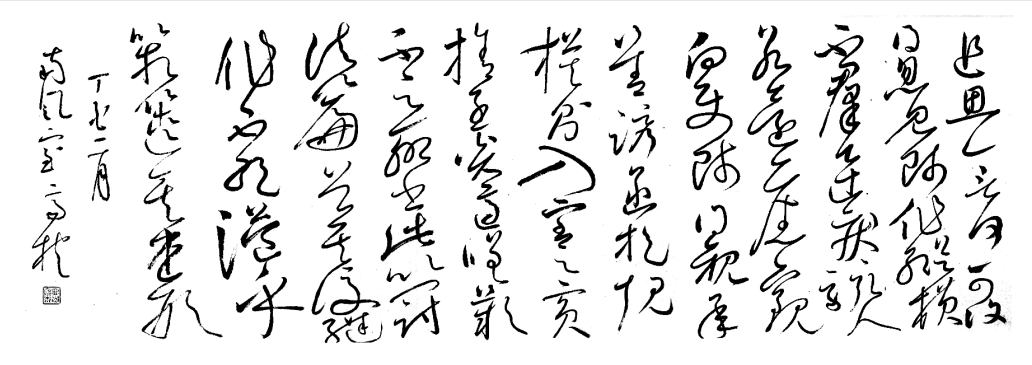
临书手记

《峄山碑》其内容为始皇东巡，群臣颂德之辞，至秦二世时丞相李斯始以刻石。姑且不论《峄山碑》之真假，刘熙载尝云“秦篆简直”，吾临此碑，深以为是：简洁而不简单，刚劲而不直楞。

《峄山碑》其字端庄工稳，滋润而不软沓，流畅而不浮滑。线条挺拔圆润，骨气洞达。解体圆浑工整，气象正大。尤其转折处方中寓圆，使得整篇精神奕烨，为小篆中“玉箸体”之典范。吾尝以为篆字之提按变化丰富者难习，深入之际方知以不变应万变最难。

张怀瓘于《书断》中定李斯小篆为“神品”，即“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莫窥其巧者。”实在贴切，亦称其用笔“骨气丰匀，方圆绝妙”，《峄山碑》是也，其字之转折，过之一分则流滑，减之一分则呆板。吾欲写其神韵则还需用功十分。

——刘亚晴



高榕临怀素《自叙帖》

临书手记

《自叙帖》是怀素于唐大历十二年所书，全卷共六百九十八字，通篇用笔圆劲挺拔，奔放流畅，一气呵成。恰如《宣和书谱》所载：“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可见其艺术特色鲜明和艺术成就之高。

我在临摹此卷时，采取了通篇临摹和局部临摹相结合的方式。通篇临摹主要是遵从其章法的完整和气息的贯通，特别注重其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相呼应带避让关系，包括远近疏密，无限大的接近原作的布局和气息，以期达到“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的效果。局部临摹则主要侧重对其细节和笔法的探索学习，特别是对用笔方法的探索，在追求用笔圆润劲挺、连绵跌宕的同时，也会关照到其用墨的浓淡干湿。

当然，在临摹之前和临摹的过程中，对《自叙帖》的文辞内容和文字草法进行反复的理解记忆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走进《自叙帖》，乃至走近怀素的基础，也是提升自我综合修养的需要。

——高榕

墨苑传奇四百年（十四）

墨言

新世纪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曹素功的制墨题材主要配合宣传革命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同时强调艺术为工农兵服务，极少宣传书画家个人。因此相当一段时间内制墨主题除了以毛主席、鲁迅的名言和墨迹外，其他名人墨基本没再制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举国同庆、大地回春，文坛空前活跃，出现了一大批欢庆胜利的诗词、书画。制墨工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创制了一批新墨，有郭沫若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王个筠、唐云、杨正新合作的“莺歌燕舞”，仿连环画创作的“三打白骨精”等。不仅造型美，而且用料好、制作精，令人耳目一新，特别受到社会好评。当然那时没有专利、版权之讲究，制墨前并未征得原作者同意，但制成后，郭老等不仅没责怪，反特别高兴和偏爱。后来郭老特为曹素功题词“光彩陆离”。然而第二年郭老就逝世了，这使此题词显得更为珍贵。

1982年曹素功的“油烟一〇一高级书画墨”荣获国家银质奖，为示庆祝，该厂特制一锭纪念墨犒劳员工，一面是银质奖牌的图案，另一面就是“光彩陆离”题词，此墨只发本厂员工，从未上市供应，如今则成藏家难觅之稀缺珍宝。

由此，曹素功墨厂更想到，大批劫后余生的老艺术家都已髦耋高龄，传统的回归，艺术的复兴，使他们焕发第二青春，创作热情格外强烈。为名家服务、与名家合作是曹素功创业发家之道，于是萌生承继传统、再创辉煌，积极开拓名家定版制墨的念头，而心中默存的“抢救”意识和责任感，更成为驱使动力。那段时间墨厂与名家合作生产了许多名家定制墨。这就有了上海墨厂黄金时代之说，一大批老书画名家和艺术团体，如中国画研究院、上海中国画院、西泠印社、荣宝斋，朵云轩等在曹素功定版制墨，形成前所未有的定制高潮。

如今在上海笔墨博物馆里，有一面墙展示的都是名人定制墨，除了清末民初的，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制作的。参观者每每在此驻足观看，详读一位位名人的介绍，细赏墨锭上留存的精美的书画艺术，这也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

在笔墨博物馆人们还能看到三块铜牌，其中两块是文化部颁发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周虎臣制笔技艺和曹素功制墨技艺，国家级非遗如今全国共有1372项、其中上海55项。另一块是文化部授予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此基地全国共98个、上海仅2个。“物以稀为贵”，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意义尤为重要。因为极大多数非遗都面临消亡之危机，亟待抢救，对非遗最有效的保护则是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营。曹素功被列为示范，无异在这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决定非遗能否后继和传承，固然有传人的因素，但根本问题却是市场。一旦市场需求消失了，就失去了根基。传统笔墨业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曾因“三笔”(铅笔、钢笔、圆珠笔)的兴起，使毛笔墨锭的日常书写功能消退，服务对象从社会大众转为书画专业群体。当时为了生存转型，采取由“量”变“质”的重心转移，成功转轨。

进入新世纪，传统文化地位提升、书画市场活跃再次带来的机遇。就墨而言，由于时代节奏的加快，书画家也开始使用墨汁(或以墨汁再用墨锭研磨)。一方面，墨锭的实用功能进一步消退；然而另一方面，其的文化内涵、收藏价值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市场消费发生变化之时，曹素功也在调整经营策略：一方面提高墨汁生产量，扩大市场份额，保持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解决生存问题。另一方面，紧抓墨锭非遗技艺的传承发展，将日常生产定位在“个性化定制”的特色服务。紧密结合市场与客户的实际需求，专注于文创产品，以及“个性化定制”服务。

主动实施生产经营的战略转型，百年老字号才能与时俱进，永葆青春活力。这些年也有不少成功案例：

文创产品中，如：2010年《世博纪念墨》，一套四锭，墨面由当代书法家高式熊、张森、王冬龄、许思豪合作以篆、隶、草、行四体书写，体现世博精神“理解、沟通、欢聚、合作”。《论语篆刻墨》以金石篆刻为主题，别具一格，由当代篆刻家骆芃芃、章群、瞿志豪、王新元分别篆刻论语名句，再现于墨面。而在纪念曹素功诞辰400周年时，又创制了《曹素功四百周年纪念墨》，限量发行四百套。还有《诸子百家》系列墨、计划邀请当代百位老书画家合作绘稿制墨的“双百工程”也已启动，首套墨由顾振乐、高式熊绘稿，已投入生产。

文创产品也不局限于新墨，墨厂仓存中保存至今的一批八九十年代老墨，也被赋予了新的生机。众所周知，墨锭也像美酒一样，越陈越好，但本身又不易保存，所以老墨价格较高。能留存几十年依然完好的老墨，其性状也十分稳定，使用效果不是新墨能比拟的，近年来涨势迅速，成为高档收藏礼品。但由于产品包装是几十年前陈旧的老式盒子，来买礼品的顾客看着包装简陋，甚为惋惜。为此，曹素功选取了部分老墨重新创意主题，组合成礼品墨：《美在久成》老墨套装，《五方献瑞》老墨套装，《笔情墨趣》笔墨套装，价格也从几百到几千，满足不同礼品需求。

同时，“个性化”定制墨重新启动，为非遗技艺的发展探寻了一条新的道路，从前几年知之甚少，到现在接单都要一再排期延后。这几年具代表性的定制墨有：

2012年，书画家陈佩秋九十华诞。谢稚柳弟子胡考，为师母定制庆寿墨。一套大小两锭，四两墨面为梅，背书“截玉轩藏墨”；二两墨面为兰，背书“高花阁藏墨”，落款均为“健碧”。边款刻“恭贺陈佩秋先生九十寿辰，胡考敬呈”，纪念意义不言而喻。

2013年，第一代海派书画大师、首任豫园书画善会会长钱慧安诞辰180周年，其孙女钱德敏在曹素功定制纪念墨。一套四锭，以家藏“梅兰竹菊”真迹为图稿，但因其中墨竹佚失，遂请豫园书画善会现任会长戴敦邦、按钱慧安笔意创作一幅盆竹图补阙，续成“梅兰竹菊”，再现了海派书画艺术薪火相传、绵延不息，实是对这位创派先辈的最佳纪念。

2015年，笔墨博物馆举办《吴湖帆书画文房藏品展》，展出的“铜柱墨”为吴大澂奉命勘定中俄边界后，所立界柱为原型定制之墨。此墨凝集着爱国热诚与人文情怀。为此吴门后裔吴元京决定参照当时的铜柱墨原型，重新定制这款纪念墨，镌刻上“吴大澂五世孙吴元京监制”边款，以表后嗣对高祖的敬意和纪念。

2016年，书画家颜梅华九十大寿定制了庆寿墨，墨面为颜老所画“梅兰竹菊”，墨背为其所书古诗句，边款刻“颜梅华九十大寿志庆定制”，体现了后辈的一片心意。

今年，笔墨博物馆举办吴湖帆弟子任书博的书画篆刻展，展后其子任德洪向曹素功定制一款纪念墨，墨面书画分别是其父所作墨竹及对联，边款刻“纪念任书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父亲在墨苑留下永远的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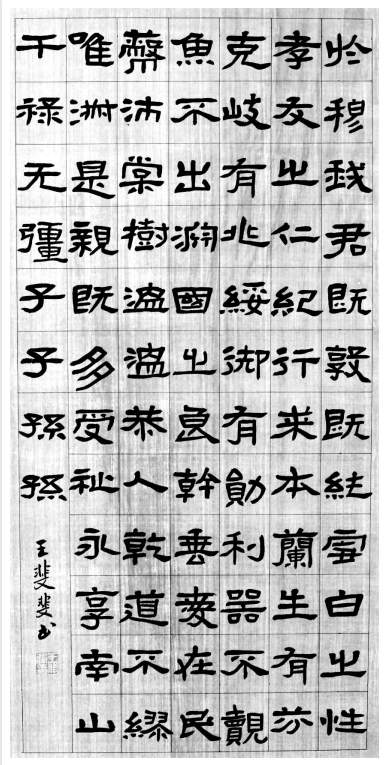
201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由上海书法家协会牵头、与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民革上海市委等多家团体联合定制纪念墨。正面镌刻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背面由书协主席周志高题写“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此墨集文史纪念、收藏价值于一体，极具传世意义。

据悉，目前曹素功正通过上海笔墨博物馆的对外平台，对书画家个人开放定制墨业务，也欢迎上海书协会员前往询洽。

如今，曹素功在传承和发展上不断探寻新的道路，扩大个性化定制墨以及文创产品的业务，正引起不少业内人士的关注。这些新时代的墨品艺术也将与曹素功一起留存于世，再谱新世纪四百年的新篇章，与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传统文化一起世代传承。

《墨苑传奇四百年》连载完结，感谢读者们一年来的关注。

敬请期待《海上造笔者：周虎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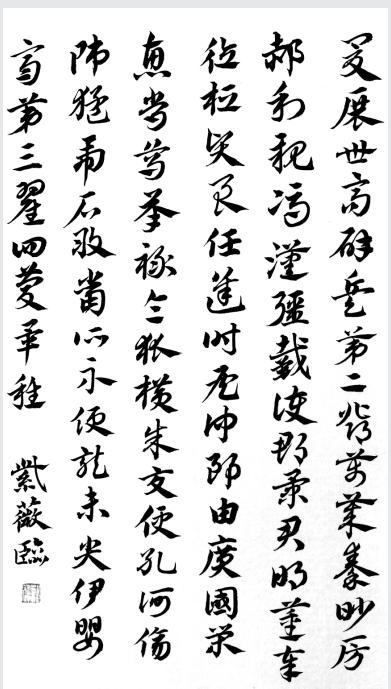
王斐斐临《张迁碑》

临书手记

余习书已数年，在汉隶上用功最多，独爱厚重之感的汉隶精品《张迁碑》。记得初接触《张迁碑》时，只是依葫芦画瓢，尤感其生涩与笨拙，并没有特别喜欢。反倒对端庄的乙瑛、秀美的曹全等碑更是喜爱。后经老师解读，细细品味之后，始识其不可多得的金石味。由此爱不释手，追随数十年而不忘初心。

《张迁碑》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方、厚、拙”，临习时不可“圆、薄、巧”，尤其是方起笔，在点画中尤为重要。余初学其方笔，只是追求尖锐的方折，字虽有十足精神气但总觉缺乏灵巧生动之气。后研习篆刻，始顿悟何为“方中有圆，外圆内方”，并以此为切入尝试改变自己的临习特点，加入一些圆转用笔增加灵动感。随后接触北碑，深入认识绞转切翻等笔法，开始把自己对张迁临习与创作进行改进，进一步丰富笔法。读研之后，日必读帖，始知之前只是研究技法，缺失对碑帖背后文化内涵的了解。在老师帮助下开始对碑帖的内容深入学习，并扩宽涉猎范围，参考其他汉隶、清隶等碑帖进行横向研读，方知自己对张迁碑的认识这才算一只脚跨进了大门，想要登堂入室，任重而道远。

——王斐斐



陈紫薇临《急就章》

临书手记

邓文原，字善之，四川绵阳人。据记载，其十五岁即通《春秋》，可谓少年才俊。年轻时与赵孟頫结识而成为至交。邓文原以《急就章》而著名，现存故宫博物院的邓文原所书《急就章》，尾有“大德三年三月十日”的落款。邓文原的此篇章草，清俊挺拔，独有风骨。

我初学章草时临习了较长时间此《急就章》，邓文原所书章草虽洒脱秀俊，但其楷法较多，虽少了章草应有的古朴和浑然天成之感，却有一种独特的“帖学意味”，故个人认为邓文原的《急就章》是“帖意章草”的代表作。临习时横画多楷书笔法，波磔较重且出锋犀利，字的整体粗细变化较明显。章法少贯连，字字独立，有劲健流美之感，正如明人袁华所跋：“观其运笔，若神出海，飞翔自如。”

——陈紫薇